听你的人生故事

“食用菌大王”陪审不算经济账

今年53岁的余绵恒是个土生土长的千岛湖农民,在当地有着“食用菌大王”的美称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他先后担任过村里的调解委员和调解主任。“调解工作做好了,村干部就能集中精力搞经济了。”就是本着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信念,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3年前,他通过了层层筛选,成了淳安县法院汾口镇法庭的人民陪审员。在陪审一个案件40元的补贴和上万元的大宗生意之间,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,为的就是肩上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结缘调解二十年 转型做了陪审员

和调解工作结缘,已经是1983年的事情了。当时,28岁的我,是镇上供销社菌种厂的厂长。那年村里选举,我高票当选了村委会委员。虽然只有初中学历,但在当时,也算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年轻人,于是我成了村里的调解委员。后来的几年里,我就一边打理着工厂,一边干着调解。

农村里,调解的都是鸡零狗碎的事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但老调解主任的一句话我始终铭记,他说,别看我们干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情,但是调解工作做好了,村干部就能集中精力搞经济了。后来,我自己当上了调解主任,一想起老主任的话,我肩头就感到沉甸甸的。

刚当上调解主任,也有村民对我这个“新人”不买账。一次,我和一个调解委员上门调解一起纠纷,一进门就被泼了一盆冷水。那个当事人是村支书的亲戚,他指着我的鼻子说,你这个调解主任算个什么,叫村支书来跟我说话。

我不气也不恼,只是板着脸孔告诉他:这个事情归我管,就是我说了算;我决不偏袒谁,谁有道理我帮谁;调解委员会盖了章的调解协议,上了法庭都是有效的。

或许是被我的样子震住了,当事人的态度马上软了下来。这时,同来的调解委员趁热打铁唱起了“白脸”。偶尔搭档唱唱“红白脸”,也算是调解工作的一个技巧。但关键是靠有理撑腰,讲法理、讲情理、讲道理。

1994年,我在全国的食用菌会议上结识了两位专家。后来,在他们的引荐下,我获得了到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进修的宝贵机会。两年后,我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拥有大专学历的农民。从初中学历来了个三级跳,我想,这下可以在食用菌培育上更有一点作为了。不曾想,这一纸文凭,会在十年之后给我带来全新的机会。

2005年初,县里选拔了16人作为人民陪审员的考察对象,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大学学历,我有幸排进了这支队伍。

考察对象要到杭州去培训,还要考试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慌了,另外的候选人要么是在机关上班,要么是正规大学毕业,和他们比起来,自己的底子太差了,一旦没考上会给县里丢脸。后来,还是老婆使了“激将法”,我才稍微有了点底气。

大概是运气好吧,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,光荣地成了一名人民陪审员。

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坐在法庭上,那一刻到今天都还在眼前。当时开庭的是个什么案子我已经不记得了,只知道自己整个身子紧绷着,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、该做什么,甚至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。庭审过程其实很简单,但我却觉得时间特别长。

当时,担任审判长的法官看出了我的拘谨,开庭结束之后,还特地跑到我面前给我壮胆。50岁的人了,还像个孩子一样频频点头,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难为情。

三年陪审有心得 亲切耐心是法宝

3年的陪审,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:基层法院的陪审员,除了公正之外,亲切、耐心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基层法院面对百姓,很多时候是靠法律来解决矛盾,让乡邻之间、亲友之间更和谐。所以,面对每一个当事人,我都要求自己耐心、亲切。

200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,法庭开庭审理了一起离婚案。开庭时间还没到,原告在她两个妹妹的陪同下先来了。她说话咬牙切齿,只说自己一定要离婚。而随后来到的被告亲属们,也认为和好无望。开庭不久,双方就“枪对枪、棍对棍”,看不到一点回旋余地,法官只好将他们暂时分开到两个房间。

此时我想,当事人都在气头上,如果一本正经地说理,未必会有理想的效果。于是,我开始用方言和他们拉起家常,气氛很快缓和了。通过一番接触,我了解到原、被告感情之所以会出现危机,是因为被告与原告父母的关系没有处理好。被告是上门女婿,结婚后一直没挣到什么钱,于是女方父母有了埋怨。

针对这个情况,我认为做好原告父母的工作是关键。也许是我的模样、说话让他们觉着信任,女方父母把家长里短诸多事情一古脑儿抖了出来,我就一个个帮着分析。常常是旧问题才解决,新问题又蹦了出来。那个下午,我就不停地在两个房间之间奔走。

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调解,终于柳暗花明,原、被告重归于好。当听到这个结果时,原告的两个妹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送走了当事人回到家,已是晚上七点多钟,妻子煮好的饭菜早就凉了,可那顿饭,我吃得特别香。

在农村,村民之间的纠纷,起因不少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在外人看来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,但当事人往往会看得特别重要,俗话说“不蒸馒头,争口气”。

有天晚上,我受法庭委托到村里去调解一起相邻纠纷。没想到,还没等我开口,当事双方就动起了手。我冲上去制止,虽然事态平息了,但我的手上却划出了一道大口子,鲜血直流。当事人立马不吵了,还都劝我到医院包扎一下。我告诉他们,我也是农民,受点小伤是常有的事。于是,把伤口简单处理了一下,我就开始调解。也不知怎的,这起原本让村干部觉得很棘手的纠纷,我却调解得特别顺利。说不定就是“意外受伤”帮了我。

陪审不算经济账 得罪亲戚也无悔

虽然在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,但我还是个地道的农民。1995年,我开始搞珍稀食用菌开发。如今,我开发的食用菌示范基地,年产值十几万元。

由于这一特殊身份,许多人对我当陪审员的事很不理解。一些不太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,是在作秀。也有一些熟悉我的人,说已经一把年纪可以在家安享晚年了,没必要再去做那么辛苦的陪审工作。对这些,我都是一笑置之。

从当上陪审员至今,我先后参与了一百多起案件的审理。3年来,我已经完全把陪审工作当做自己事业的一部分,努力学习法律知识,从来没有迟到、缺席过一起庭审。

当然,培育、销售食用菌都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陪审工作与我的主业难免会有冲突。然而,每次拿到法院的案件排期表,如果发现开庭时间跟工作有冲突,我都是优先保证开庭,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。

一次,一个外地客商不远千里慕名来到千岛湖,到我的食用菌基地洽谈业务。不巧的是,当天上午我要去陪审一起案件。于是我对他说,自己上午有事,希望能放到下午商谈。那个外地客商很生气,认为我没有诚意,一怒之下转身想走。可当他听到我的助手说,我是因为开庭陪审而要求延期洽谈,他马上停住了脚步,表示没有问题,下午就下午。事后,那个客商说,想不到你一个商人,却是古道热肠,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如今,那位客商是我最大的客户之一。

3年中,因为陪审推掉的业务并不在少数。陪审一次,我可以得到40块钱的补贴,但也常常耽误上万块钱的生意。很多人不理解,说我傻,但我的格言是:陪审不算经济账。

做了廿多年调解工作,汾口镇认识我、称道我的人很多,但在亲戚朋友眼中,我有时并不受“欢迎”。

有一次,一个亲戚因为一起人身损害纠纷想请我给予照顾,但被我委婉拒绝了。开庭当天,那个亲戚直接找到了主办法官,说他是我的亲戚,希望法官能够关照。这一幕恰巧被我看到,我当场就把那亲戚给骂了个狗血喷头。法院里很多人一向觉得我老余挺和气的,突然发起那么大的火,他们都惊呆了。

原告当时也看到了,虽然知道我是被告的亲戚,但在开庭时明确表示不需要申请回避,因为信得过我。这件事之后,我去被告家拜年吃了闭门羹。但即使是这样,我到今天也没有为自己当时的态度感到后悔,认准了是对的,谁说也没用。

当上人民陪审员,一直都是我的骄傲。虽然已经年过半百,身边其他的陪审员也已换了一茬,但我想,只要法庭需要我,我会一直干下去。

■口述:余绵恒 整理:陈岚 姜德英 吴嘉源

主持人的话 这是一个名为“旁听”的栏目,特别推出“听你的人生故事”。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,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,或许你的故事给人启迪。一个故事,一段人生。心情热线:87054420,你的故事,有我在听。